

A Genealogy of Gender Criticism

Lu Yang

Abstract: Gender criticism emerged from literary criticism, marked by Eve Sedgwick's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In this book, the author presents the concept "male homosocial desire" and admits that the concept is hard to define with internal paradoxes and is marked with discrimination against homosexuals. However, she argues that men indeed use this concept to construct their social identity. She quotes sources to illustrate that since the time of ancient Greece, the "male homosocial desire" has been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male bound, which weighs much more than the female bound and even the heterosexual bound. In her preface to the 1999 edition of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Judith Butler admitted that she never expected that her book would be so influential that it challengingly "intervened" into the feminist theory, even considered one of the founding works of this "queer theory." Even then, she was clearly aware that the text she was producing was part of the feminist theory itself. Butler has noticed that it is a continuing ques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whether her work and works by Homi Bhabha, Spivak and Žižek belong to cultural studies or critical theory; however, she also holds that the debate itself shows the collapse of the demarcation between cultural studies and critical theory, a result that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graceful heritage of the long story of "French Theory". Butler's essay *Imitation and Gender Insubordination* (2009) ends with a sentence "If Aretha sings to me", in the end of the book,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Paul Fry, has to do with literary theory. The masterpiece of the "queer criticism" has to be David Halprin's *Saint Foucault: Towards a Gay Hagiography*, which was triggered by the criticism of his *A Hundred Years of Homosexuality* (1990) by Richard Moore's *The Idea of Homosexuality* (1992). Halprin holds that Foucault practices his arguments in support of the marginalized discourse and that this is why Foucault's life, more so than his works, continuously influences a generation of scholars, critics and activists. If it is said that the "queer theory" emerged in following the path of Foucault, the publication of Jagose's *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arke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study of male and female homosexuality to that of such a bewildering concept as "sexual identity". With such transition, sexuality became the center of queer theory and performative gender studies, and this has become hot topics in gender criticism. This is despite the fact that even though Foucault has written three volumes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he has never directly discussed what is sexuality.

Keywords: gender criticism, Sedgwick, Butler, Halprin, Fry

Author: Lu Yang received his Ph.D. in literature from Fudan University in 1990. He taught respectively a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Nankai University. Currently, he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Fud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aesthetic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Derrida: The Dimension of Deconstruction*, *Aesthetics of Death*, *Medieval European Poetics*, *A Post-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ext: Foucault and Derrida*, *Landscape of Post-Modern Culture*, and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Studies*.

“性別批評”的前世今生

陸揚



[摘要] “性別批評”是從文學批評開始起步的，塞吉維克的著作《男人之間：英國文學與男同社會性慾望》應是一個起點。在該書中，作者提出了“男同社會性慾望”概念，認為這一概念雖然多有矛盾，很難清楚定義，而且本身充滿對同性戀的歧視，但男人們確鑿無疑是在用它塑造着社會身份。她還引經據典地說明，從古希臘開始，“男同社會性慾望”就在促進“男性紐帶”的形成；而女性之間的關係，甚至男女之間的關係，在它面前顯得不值一提。1999年，巴特勒在給《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一書所寫的“再版序言”中，稱沒有想到她當年這部著作會影響如此之大，而且挑戰性地“介入”了女性主義

理論，甚至被視為“酷兒理論”的奠基作之一。即便彼時，她知道自己筆下這個文本也還是女性主義本身的一個部分。巴特勒注意到，她與霍米·巴巴、斯皮瓦克、齊澤克等人的著作究竟是屬於文化研究還是批評理論，學術界是有持續爭論的，但她覺得，這恰好表明，文化研究與批評理論之間的森嚴壁壘給瓦解了。而這一切，終究是受惠於讓人一言難盡的“法國理論”。巴特勒2009年的《模仿與性別不合作》一文，根據保羅·弗萊的分析，結尾處“假如艾瑞莎對着我唱歌”一語，事關文學理論。“酷兒批評”的代表作可推哈爾普林的著作《聖福柯：走向一種同性戀聖徒傳》。該書緣起於理查德·摩爾1992年出版的《同性戀觀念》一書對他1990年的《同性戀一百年》的批評。哈爾普林認為，福柯是身體力行地實踐了他為邊緣話語張目的政治主張，這也是福柯的生平甚至比他的著作更持續不斷影響了整整一代學者、批評家和活動家的原因。如果說“酷兒理論”正是在追隨福柯的道路上應運而生，那麼，雅戈斯1996年出版的《酷兒理論導論》，標誌着男女同性戀的研究過渡到研究“性認同”這類無邊無際的概念上了。以“性”為中心來講解“酷兒理論”和“性別操演”的個中究竟，由此也成為性別批評的熱門話題。然而，回看當年的福柯，雖然曾寫過三卷本的《性史》，但也從來沒有直接談論過什麼是“性”。

[關鍵詞] 性別批評 塞吉維克 巴特勒 哈爾普林 弗萊

[作者簡介] 陸揚，1990年在復旦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任職於廣西師範大學、華中師範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南開大學；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文藝學與文化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德里達：解構之維》《死亡美學》《歐洲中世紀詩學》《後現代性的文本闡釋：福柯與德里達》《後現代文化景觀》《文化研究導論》等。

“性別批評”在當今西方文論中尚未構成一個流派，緣由之一是對“批評”一語如何理解？若按照約定俗成的認知，理解為文學和文化批評的話，那麼，可能發現，“性別批評”作為“女性主義批評”的後現代狀態，以及作為男同性戀研究、女同性戀研究，進而言之“LGBT”〔女同性戀者（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雙性戀者（Bisexuals）、跨性別者（Transgender）英文首字母縮略〕研究的委婉說法，它並不經常以文學文本為批評對象。也許假以時日，這個現象會有所改觀。但同樣不容忽視的是，性別批評，甚至其極端形式“酷兒批評”的起步，卻真是從典型的文學批評開始的。

一 男同社會性慾望

1985年，執教於紐約大學的塞吉維克（E. K. Sedgwick, 1950—2009）出版了《男人之間：英國文學與男同社會性慾望》一書，該書可視為“性別批評”的起點。七年後，她又給此書添加了一個“新版序言”。在“序言”開篇，她便告訴讀者，當年寫作此書的時段裏，她本來很可能是在食品店裏打工——那是一個工作機會稀少、“女性主義批評”幾成衆矢之的的時段，她的終身教職又渺無蹤影，唯獨這本書的寫作本身成了莫大的快樂。這段不無心酸且又自豪的個人回憶，可以讓人們看到，塞吉維克當年寫作這部後來讓她迅速成名的大著，是怎樣帶有深刻的個人印記。

在該書的“導論”中，塞吉維克開宗明義地交代，她有意討論英國文化中一段相對比較短、比較新近，也比較容易理解的時光；具體地說，是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的小說所反映的這段光陰。這個時段，無疑是光彩奪目的，其間經濟、意識形態、性別態度都發生了嗣後影響深廣的變化。但最重要的是，“男同社會性慾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隨之發生變化，呈現出了新的形態。所謂“男同社會性慾望”，塞吉維克給出的解釋是，這是一種矛盾修飾法，有意同時表達歧視與悖論。它的前提是“同性社會性慾望”（homosocial desire），這不是新鮮的話題，因為它在歷史和社會科學中露過幾面，指的是同一性別中人們之間的社會紐帶；但這個概念既來源於“同性戀”，又與“同性戀”有所不同。特別是當它被用於“男性結合”這類活動時，在社會中會引起強烈的恐懼和憎惡感，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恐同症”。故而，將“同性社會性”拉回到“慾望”和潛在的情色軌道上來，也就是在假設，“同性社會性”與“同性戀”之間的某種延續關係似乎是牢不可破的。

塞吉維克指出，雖然在大多數人看來，上述同性社會性和同性戀之間的延續關係，今天是搖搖欲墜了，但是她覺得這聯繫依然是完好存在的，不是存在於基因遺傳之中，而是說男人們依然是在用它來塑造着社會身份。這也是“男同社會性慾望”這個概念的由來。塞吉維克指出，這個概念雖然多有矛盾，很難清楚定義，而且本身充滿了對於同性戀的歧視，但實際上它是與其他表面上一目瞭然的關係，諸如友誼、師徒、競爭等，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後者無一例外涉及與女性的關係，以及作為一個整體的性別系統。“男同社會性慾望”當然與“男性同性戀”比肩而生，但是在塞吉維克看來，兩者之間牢不可破的紐帶卻不在於性器官的接觸，而在於寫真男人和其他男人之間的更具有社會性的關係。

然而，塞吉維克是女性，她對男人與男人之間的情感瞭解又有多少？塞吉維克自稱，她對這個問題是有清醒認識的。在1992年《男人之間》的新版序言中，她說，該書出版若干年後，有一次她遇到邁克爾·林奇（Michael Lynch），這位男同性戀研究的先驅告訴她，他讀《男人之間》的第一個反應是：“這個女人想法不少，可是她對男同性戀其實無知！”塞吉維克坦陳，林奇沒有說錯，自己多年來是在女同性戀圈子投身於女性主義文化和批評，在真實生活中，公開的男同性戀者，她祇認識一個人。她對此的辯解是，到20世紀90年代，學術界對男女同性戀的研究已經精細入微，訴諸行爲，而且有“酷兒研究”（queer studies）嶄露頭角，以往的性別、種族、性定義的邊界縱橫交錯，壁壘已經紛紛破解；所以，雖然她個人經驗可能單薄，但依然為這本書感到自豪。

之所以用“慾望”(desire)而不是用“愛”(love)來凸顯“男同社會性慾望”裏面的情色成分，塞吉維克解釋說，因為在文學批評中，“愛”經常是指向名某一種特定情感，“慾望”則用以命名某一種結構，所以用“慾望”這個詞，更適合深入“力比多”(libido)的精神分析層面。“慾望”不是指特定的情感狀態，它波及更廣泛的社會情感力量。塞吉維克援引美國古典學家肯尼思·多佛(Kenneth J. Dover)有爭議、傳佈廣泛的著作《古希臘同性戀》(1978、1989、2016)，強調該書中提供的考古學、哲學、文學文獻等證據都表明，同性戀古已有之，在希臘文化中廣為流佈，也是合法的行為。不同階級、不同公民階層以及不同年齡的年長男人追求少年，在古希臘文學和哲學中的描寫，浪漫一如後代異性之間的情感。但是，這裏涉及社會問題，因為少年方面是處於被動狀態，同時隨着少年進入成年，角色便也發生位移。對此，塞吉維克注意到：

因而這種愛情關係，雖然對象暫時受壓迫，也具有強烈的教育功能；多佛引用了柏拉圖《會飲篇》中包薩尼亞的話：“有人幫他（男孩）提高心靈和性格的話，他為這人提供任何服務，都是正確的。”這裏除了色情成分，還有師徒關係。男孩是學徒，他要學習雅典公民的德行，也會繼承他們的特權。這些特權包括支配男性和女性奴隸的權力，還包括支配一切階級的女性的權力，包括他自己的階級在內。^①

在這個古希臘時代烏托邦中，塞吉維克讀到了女人與奴隸的並立狀態。她並且引阿倫特(H. Arendt, 1906—1975)的話，婦女與奴隸屬於同一類人。在她看來，古希臘的同性戀教育中，即已經是男性文化全面掌握着性別權力，婦女在其中的地位形同奴隸。正因為此，塞吉維克用“男同社會性慾望”來解釋西方文化中“男性紐帶”的形成。她還援引列維-斯特勞斯(C. Lévi-Strauss, 1908—2009)在其著作中多次將女性描述為男人之間交易的“禮物”，認為父權的社會組織方式，正是通過男人將女人作為禮物互相交換，從而平息競爭，形成同盟。女性在男性的社會交易中，從西方文化的源頭開始，就淪落為了交易手段。簡言之，即便是女性同性社會性紐帶與同性戀紐帶之間的關係，比起男性同性社會性紐帶與同性戀紐帶之間的關係，也是極不對稱、極不平衡的。

《男人之間》第二章以“戀愛中的天鵝”為題，分析了莎士比亞(W. Shakespeare, 1564—1616)的幾首十四行詩。她發現，在非小說文本中，有兩部作品表現出了強烈的男性同性戀的互文性。一部是惠特曼(W. Whitman, 1819—1892)的《草葉集》，另一部就是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塞吉維克認為，莎士比亞的154首十四行詩不同於《草葉集》的地方，在於它們家喻戶曉的普及性。祇可惜，作為男同性戀的經典來普及流通，距離它們最初的社會、情色和敘述語境卻已經過去了數百年。這154首十四行詩是不是一個系列？什麼時候寫的？寫給誰的？是幾個人？它們是自傳體嗎？還是從俗？為什麼出版？塞吉維克指出，這些問題歷來眾說紛紜，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說，這些十四行詩的對象往簡單說，祇有四個人：詩人、俊美青年、對手詩人、黑膚女郎。這個簡化版的理論，事實上也是塞吉維克本人讀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直觀感受。所以，這些詩歌的男同社會性慾望分析，不奇怪也就以此作為範型了。

塞吉維克認為，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是該書第一章中提出的性慾三角和性別不對稱理論的絕好例證。所謂“性慾三角”，是指兩個人同時愛上一個對象之後，三個人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她說，根據法國哲學家吉拉爾(R. Girard, 1923—2015)的追隨者們的讀法，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敘說人，對俊美青年與黑膚女郎一樣鍾情有加，而在最後一組詩裏，兩人是成了情敵；敘說人的觀點，也是莎士比亞的觀點。然而，鮮有批評家注意到，這些詩裏的“性慾三角”與性別不對稱，是對仗得多麼工整。她舉了第42首的例子：

你擁有她，那並非我全部悲哀，

^① Eve Kosofsky Sedgwick,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4.

可是我對她曾經愛得那般深沉；
 她擁有了你那纔讓我傷心欲絕，
 愛的失落啊愈發讓我痛不欲生。
 愛情的罪犯們，我且寬恕你們：
 你愛她，祇因為你知道我愛她；
 她作踐我悉盡是為着我的緣故，
 為我緣故折磨我朋友來取悅她。
 失去你，我所失是我情人所得，
 失去她，我好友便宜撿了個漏；
 你倆各得其人，我是一丟兩個，
 兩個都為我緣故給我背十字架：
 但快樂在其中：好友與我同在；
 謝天謝地！她卻祇愛我一個。

塞吉維克認為，從這首詩裏可以看出，不奇怪像克里格（M. Krieger, 1923—2000）這樣的批評家，會堅持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寫情、寫愛什麼都寫，就是閉口不談性別。至少從第1首到第126首，即傳統被認為是寫給一個青年的，就是這樣。她反對克里格堅持要將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解讀為在敘寫新柏拉圖主義的貞潔愛情。她說：“可是這首十四行詩並不是新柏拉圖主義，甚至不是柏拉圖主義，而即使是在這裏，為求一種一廂情願而且有助康復的對稱平衡觀念，情人之間、情愛之間‘偶然’差異的修辭性消抹，也是一以貫之，非常徹底。”^①簡言之，莎士比亞這首十四行詩在塞吉維克看來，形象佐證了她的“情慾三角”和“性別不對稱”之間形影不離的對稱關係。真所謂朋友如手足，情人如衣服。

二 操演性別

在20世紀末葉的性別批評中，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別操演”理論異軍突起。1999年，巴特勒在給她九年之前出版的《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一書所寫的再版序言中，承認她當年交付與勞特里奇出版社發表的這部著作，沒想到會影響如此之大，沒想到它會挑戰性地“介入”了女性主義理論，更沒想到它會被視為“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的奠基作之一。她回憶說，寫作此書的時候，明白自己是處在一個與女性主義的某些形式格格不入的地位，即便她知道筆下這個文本也還是女性主義本身的一個部分。

巴特勒承認，她的理論受到法國後結構主義的影響；也注意到，她自己的著作以及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齊澤克（Slavoj Žižek）等人的著作，是屬於文化研究還是屬於批評理論，學術界持續爭論不休。但是，她覺得，這類問題也許不過是表明了，文化研究與批評理論之間曾經何其森嚴的壁壘，如今是瓦解崩潰了。而這一切，終究是受惠於叫人一言難盡的“法國理論”：

《性別麻煩》根子在“法國理論”裏，它本身是種稀奇古怪的美國建構。祇有在美國，那麼多迥然不同的理論纔會攜手並進，仿佛組合成了某一種團體。雖然本書翻譯成了多種語言，特別是對德國的性別和政治討論發生了巨大影響，它如果最終也有此榮幸的話，它進入法國會較進入其他國家晚得多。我說這些，是強調這本書裏顯而易見的法國中心主義，與法國，以及理論在法國的生活，相去何其遙遠。^②

即便相去遙遠，巴特勒承認，她是有意識以一種融會貫通的方式，來讀形形色色的法國知識分子

^① Eve Kosofsky Sedgwick,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30.

^②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x.

如列維-斯特勞斯、福柯 (M. Foucault, 1926—1984)、拉康 (J. Lacan, 1901—1981)、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等，這些人彼此少有聯絡，他們的法國讀者也很少彼此交叉閱讀。是以這些新進理論在此書中的呈現，完全是美國式的，與它們的法國語境相去遙遠。簡言之，《性別麻煩》本身，便也是法國理論“美國化”的產品。

巴特勒認為，福柯的《規訓與懲罰》是改寫了尼采 (F. W. Nietzsche, 1844—1900)《道德的譜系》中的話語內在化理論。她指出，在福柯看來，統治階級對犯人施行的策略，不是硬性壓制他們的慾望，而是逼迫他們的身體循規蹈矩，以使森嚴法律成為他們的本性、作風和必需。法律不是深入內心給內在化了，而是給組合進了身體。身體就是法律的體現。法律是犯人們的自我本質、靈魂和意識的意義、慾望的法則。然而，它是那樣自然而然地無所不在，從不表現為身體的外部控制。巴特勒引了福柯的這樣一段話：

要說靈魂是一種幻覺，或某種意識形態效果，那就錯了。恰恰相反，靈魂是存在的，它具有一個實體，它永遠是通過權力作用於那些被懲罰人衆，在身體周圍、在身體上面、於身體內部生產出來。^①

這是說，內在的靈魂不是寄宿在身體內部，而是刻寫在身體上面。就像接下來福柯所說的那樣，一些基督教的比喻就暗示，靈魂是身體的牢籠。

靈魂如此，性別亦然。巴特勒指出，性別認同不是內在天生的，而是“操演”出來的，是人們的行為、姿態、慾望生產出來一種內在本質的效果，加諸身體上面，由此在身體的性別符號中，編織進無所不在的性別的操演性質。這意味着，不存在天經地義的本體論式的性別身份。所謂的性別天性，不過是形形色色社會話語和權力，不斷操演下來作用於身體的結果。而倘若性別的內在本性不過是後天編織而成，倘若真實性別的概念不過是刻寫在身體表面的一種幻象，那麼，性別就無所謂真偽，而不過是某一種基本身份認同的真實話語效果罷了。

這一切與文學理論又有什麼關係呢？關係是有迹可循的。不但有迹可循，而且毋寧說這也是西方當代文學理論的一個寫照。耶魯大學英語教授保羅·弗萊 (Paul H. Fry) 2012年出版的《文學的理論》一書，是他26篇耶魯講座的結集。在第23章《酷兒理論與性別操演性》中，弗萊分析了巴特勒的著名文章《模仿與性別不合作》。他的分析大體與巴特勒本人的文章相似，不厭其煩地解釋性別是文化和社會建構，而不是天生使然，通篇似乎無關文學理論，但他認為巴特勒在文章結尾處說“假如艾瑞莎對着我唱歌”，就是事關文學理論了。他的分析是這樣的：

你們有時候也許會問，我說的這一切與文學理論又有什麼干係？一點不錯。可是，我希望你們注意，巴特勒在文章的結尾部分說，“假如艾瑞莎對我來唱”，那就是提供了一個寓言式的文本應用例子。“你使我覺得”——不是一個“天生”的女人，因為沒有天生的東西。“你使我覺得像一個天生的女人”，“你”假定是一個正統異性戀者，教我做一個女人真正是什麼樣子。這裏“像”沒有給加上着重符號，因為現在的意思是我（“你”）使她覺得如影隨形，仿佛她，作為一個女同性戀者，是天生的。或者假如她對着一個變裝女王來唱：祇有變裝的男人纔能說，她感覺她自己就像是天生的。這個歌詞文本的閱讀，顯而易見就是受惠於文學理論。^②

《模仿與性別不合作》一文發表於2009年，文章一如既往地重申作者的性別操演理論。文中的艾瑞莎，即艾瑞莎·弗蘭克林 (Aretha Franklin, 1942—2018)，是年長巴特勒十四歲的美國流行音樂黑人歌手。巴特勒舉例說，當艾瑞莎唱“你使我感到自己像個‘天生的’ (natural) 女人”時，她似乎一開始是暗示她生理性別中的某些自然潛質，通過她參與“女人”的文化角色，得以

①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1979), 29.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172.

② Paul H. Fry,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310-311.

實現了。這個“女人”，是異性戀所承認的對象。她作為生理事實的“性”（sex），與異性戀場景中的公開“性別”（gender），兩者之間是沒有斷層的。雖然艾瑞莎看起來是很高興她的自然氣質得到了肯定，卻是滿腹狐疑而且是自相矛盾地感覺到，這“肯定”從來就沒有保證，它祇是建立在異性戀承認的前提之上：

說到底，艾瑞莎唱道，你使我感到像個天生的女人，是暗示這是一種隱喻替代，一種欺蒙行爲，是一種崇高的轉瞬即逝的參與，參與異性戀變裝者日常運作所產生的本體論幻想。

但是，假如艾瑞莎對我來唱又會怎樣？或者說，假如她對她的操演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自我的變裝女王來唱，又會怎樣？^①

是啊，假如艾瑞特對着巴特勒來唱“你使我感到像個天生的女人”，巴特勒會感到怎樣？她會對自己的變裝女王身份有須臾疑慮嗎？抑或讓她益發深信不疑，性別不過是一種模仿，一種表演？

三 酷兒批評

巴特勒在《性別麻煩》一書“再版序言”中所說的文本接受語境的變化，也包括“酷兒理論”的崛起。所謂“酷兒理論”，是在20世紀90年代從女性主義研究、“LGBT”研究中脫穎而出，進而自成一體的性別理論。性別批評的理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應是近年方興未艾的“酷兒理論”。它奉福柯為聖徒，與主要以“LGBT”人群為對象的“酷兒研究”還有區別。“酷兒理論”雖然也是緣起於女性主義對自然性別的挑戰，以及同性戀研究之深入考察性行爲和身份的社會建構性質，但“酷兒研究”主要關注同性戀行爲的不平等地位，而“酷兒理論”的視野則更廣泛，其倡導對一切性行爲和性向身份都展開批判分析。^②美國性別批評家哈爾普林（David M. Halprin）在其《聖福柯：走向一種同性戀聖徒傳》一書中，即給“酷兒”下過這樣一個定義：

“酷兒”從其定義上說，是指一切與規範、法理和主導文化格格不入的東西。它並不必然特別專指任何對象。它是一種沒有本質的身份。因此，“酷兒”界定的不是哪一種實證性，而是一種直面規範的關聯式結構。^③

哈爾普林因其性別批評、酷兒理論建樹獲得多種榮譽，他本人毫不掩飾他的同性戀傾向。問題是，當酷兒理論意欲超越性別批判，將形形色色的社會不平等一網打盡時，它是不是同樣面臨着一個身份迷失的問題？^④

在《聖福柯》一書的“導論”中，哈爾普林交代了他寫作此書的因由。這個因由，得從任教伊利諾伊大學的美國哲學家理查德·摩爾1992年出版的《同性戀觀念》談起。他指出，摩爾在該書中批判了許多觀念，其中之一便是“性別是為社會所建構”的觀念。這個觀念雖然在男女同性戀研究和文化研究中非常流行，但並不符合他心目中的“同性戀”正確範式，是將人引向泛泛之談的酷兒時尚，而不是專門的同性戀研究。當中的影響，首先是來自福柯。福柯是同性戀者，1984年因艾滋病辭世，他的生平和著作則成了許多男女同性戀者以及各式各樣文化研究激進學者的不二經典。他引了摩爾《同性戀觀念》中的這樣一段話：

在男女同性戀研究學科的學者中間，幾乎是舉世公認，社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在同性戀中起着決定性作用，同性戀是由文化所建構的，或者說是文化的產物。確實，這個尤其得到米歇爾·福柯支持的文化決定論的變種——同性戀社會建構論——在男女同性戀研究內部，業已成就了聖徒一般的地位。^⑤

像這樣以同性戀文本為對象展開的同性戀的批評文字，可視為“酷兒批評”的典型文本。由於哈

① Judith Butler, “Imitation and Gender Insubordination”, Julie Rivkin and Michael Ryan ed.,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London: Blackwell, 2017), 959-960.

②④ 陸揚：“西方當代文論的五副面孔”，《南國學術》3（2015）：162—163。

③⑤ David M. Halprin, *Saint Foucault: Towards a Gay Hag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62, 3.

爾普林從不諱言他的同性戀性向，是這一領域功成名就的人物；而福柯之被他冠名為“聖徒”，摩爾以上著作是因由之一。

哈爾普林接着說，摩爾在該書中提到了他1990年的著作《同性戀一百年》，以作為支持同性戀社會決定論的依據。沒錯，在《同性戀一百年》裏，他是運用過某種社會建構的方法，來分析古希臘社會的男性色情，但摩爾曲解了此書，由此來佐證他“對聖福柯頂禮膜拜”，則為他始料未及；而且，在好幾章裏面，摩爾都提到了他的名字作為反面例子，所以他要來反駁一下。首先，關於福柯，哈爾普林說道，就他所知，從來沒有提出過諸如同性戀為什麼發生、它是生理使然還是社會使然這一類經驗性問題。福柯寫“性”的歷史是從話語角度來寫的，不是從所謂的科學角度來寫的，而且從來沒有像摩爾所說的那樣，公開“支持”過同性戀是為社會建構這樣的觀點。對於天生同性戀傾向與社會條件之間的關係，哈爾普林也引福柯訪談錄中的材料，強調福柯事實上也一直表示無可奉告。

可是，崇拜福柯又怎麼樣呢？哈爾普林指出，摩爾對他冷嘲熱諷並非空穴來風。原委是，福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已經光鮮不再，以至於今天的讀者很難用一種理性的、非病理學的態度來看待他。福柯是這個時代最傑出、最有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如今的名聲卻變得雲譎波詭起來，這反倒使他逐漸改變了對福柯的態度，從隔開一段距離的崇拜者，變成全身心的認同者。他指出，他沒有見過福柯，對福柯生平的瞭解也僅限於讀過三本近年出版的福柯傳記，他在寫《同性戀一百年》的時候並不崇拜福柯，但是現在不同了，福柯真他媽的是個聖人，他的性生活和道德生活都是完美無缺的。哈爾普林說，他對福柯的崇拜裏沒有私人的成分，就像崇拜他讀過的一切其他偉大作家一樣，不論是古代作家還是現代作家：

假如福柯沒有完美的人生來證明我的崇拜果然不虛，我肯定不會認為他一生就是知識和政治生活的典範。我相信他作為一個同性戀知識分子，來把握他的整個政治境遇方面，其遊刃有餘是為自古以來第一人。不僅如此，福柯對他自己境況始終是針鋒相對的正確理解，使他得以針對困擾着他自己實踐的話語和制度狀況，構想出雖然是非系統的，卻是行之有效的抵抗模式。^①

在哈爾普林看來，福柯是身體力行實踐了他為邊緣話語張目的政治主張，是以為什麼福柯的生平甚至比他的著作更能持續不斷影響了整整一代學者、批評家和活動家。

“酷兒理論”正是在追隨福柯的道路上應運而生的。新西蘭學者雅戈斯（Annamarie Jagose）1996年出版的《酷兒理論導論》，標誌着男女同性戀的研究過渡到研究“性認同”（sexual identity）這類越深入下去越沒有邊際的概念。雅戈斯追蹤了19世紀的男女同性戀描寫，並引述巴特勒、哈爾普林等人的觀點，提出酷兒理論是開闢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不僅挑戰諸如異性戀、同性戀這類傳統的性認同，而且鋒芒可以直指性別、男人、女人這樣自古以來天經地義的概念。關於“酷兒”概念的由來，她的相關介紹是：

酷兒研究關注性、性別和慾望的錯亂匹配。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酷兒的主要指向是那些所謂的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但是，還有很多人不知道，酷兒的指向除了男女同性戀者，還有易裝、雙性同體、性別模糊，以及性別校正手術。^②

這表明，“酷兒研究”是來源於同性戀研究，但是又超越了同性戀研究，涉及了性別操演的各個方面。雅戈斯提醒讀者，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本身是兩個差異極大的領域，相提並論並不恰當。是以“酷兒研究”打破的不僅是“同性戀/異性戀”這個二元對立，而且期望能在種族、階級、宗教等領域有所突破。但是，如前所述，當“酷兒理論”意欲超越性別批判，將形形色色的社會不平等一網打盡，它是不是同樣面臨着一個身份迷失的問題？

① David M. Halprin, *Saint Foucault: Towards a Gay Hagiography*, 7.

② Annamarie Jagose, *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這個問題可以引導我們回到酷兒研究的中心問題。假如“酷兒理論”是廣泛抵抗理論的另一別稱，它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同樣將成爲一個問題。是以酷兒理論可以有它自己的特定關注對象，這個對象或者說酷兒研究的核心問題便是“性”（sexuality）。可以發現，“性特徵”作爲英語“sexuality”的中文對譯，肯定是不完備的。可是，英文中的“sex”一語可以加一個尾碼，來強調它的本質或者說哲學屬性，而假若中文如法炮製，在“性”後面也加一個“性”，以成“性性”，在我們的語言使用習慣裏必將不知所云。“Sexuality”一般認爲是指人類與性相關的行爲和表達，從生物、生理、色慾、情慾到情緒、精神層面，不一而足，你願意怎麼理解，就可以怎麼理解。但是，從中文裏找出這樣一個相對的詞彙，迄今看來還是很難。有人將“sexuality”這個語詞闡釋爲“性向”，但這個闡釋是受特定語境限制的。或者，它可以翻譯成“性特徵”，但依然似有以偏概全之嫌。按照語言約定俗成的原則，這裏姑且以加引號的“性”來翻譯“sexuality”，同時後面附上英文，以顯示此“性”（sexuality）有別於他“性”（sex）。

保羅·弗萊在他《文學的理論》一書中，即以“性”（sexuality）爲中心，講解了“酷兒理論”和“性別操演”。什麼是“性”（sexuality）？弗萊說，這個問題會讓大家愣上一愣。因爲，“sexuality”這個詞還比較新近，過去的合法語言中是沒有這個詞的。過去的日子是好也罷，不好也罷，那時候人們並不討論“sexuality”，人們談的是“sex”。不論是正常的行爲也罷，異常的行爲也罷，有“sex”這一個詞，也足夠應付了。但是，“性”（sexuality）一語具有更多社會維度，傾向於去肉慾化。按照弗萊的說法，“性”（sexuality）是暗示了人們一種更爲本真的存在，比自我更要自我。他引用福柯《性史》中的一段話，談了什麼是“sexuality”：

簡言之，聯姻調度適應於社會群體的某種自我調節，其功能在於維護這個群體；所以它與法律有着天生聯繫，即是說，法律反映了關於家庭的當前社會假設。比如，家庭不是兩個結婚的男同性戀者帶上孩子。“生殖”這個詞的意思，也是這樣。“性”（sexuality）的調度目的不在於生殖，而是在於增值、創新、增加、創造，以日漸細微的方式穿透身體，在於以一種越來越全面的方式控制人口。^①

弗萊指出，福柯這裏是提出了兩種調度模式，一是聯姻調度，一是“性”的調度。前者是對一種特定文化裏核心繁殖單位的界定，那通常是家庭，它把亂倫和可能導致亂倫的相關行爲排除出去了。後者“性”的調度，可以理解爲福柯是在談“性”（sexuality）。福柯比較靦腆，他洋洋灑灑的《性史》並沒有公開來談什麼是“性”。“性”的調節沒有受到任何國家機器和法律制度的壓抑，給它施加壓力的祇有各種各樣的輿論。由此導致的生育控制或同性戀，就與聯姻調度構成了微妙衝突。弗萊重申，福柯的中心觀念是權力，權力控制話語，使之成爲知識，而使普通人不知不覺、心甘情願被奴役其中。由此回到前面的問題：什麼是“性”？弗萊以福柯爲例的解釋是：

福柯非常靦腆。他在談“性”，他寫了三卷本的《性史》，但是他沒有來談“性”本身，來談在這裏“性”自身意味着什麼。他在談“性”的調度，在談權力—知識如何建構了“性”，讓我們唾手可得，使之成爲我們慾望表達的日常操演，卻又不讓我們須臾洞見我們不懈追逐之物的本相：“性”的性質。它依然迷失在權力向量的交鋒之中。^②

按照弗萊的說法，這還是福柯論“性”帶給我們的遺憾；到巴特勒，什麼是“性”這個問題本身已不成爲問題了。也許人們覺得這個問題單純，不帶任何偏見，可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編者註：此文是作者承擔的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方新馬克思主義文論與空間理論重要文獻翻譯和研究”（15ZDB084）的階段性成果。〕

①② Paul H. Fry,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301, 302.